

乱点鸳鸯谱

——论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之章太炎篇

○ 丁守伟

(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, 湖北 武汉 430079)

[摘要]胡文辉在其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中,把章太炎列为“旧头领一员”,将之摒于现代学林正榜之外,认为与康梁与罗王相比,章黄学派在政治上激进,在学术上保守,章黄学派对现代学林的影响并不深刻。笔者认为,胡先生对章太炎的点评,纯属乱点鸳鸯谱,并从文中对章太炎所指摘的排满革命、门户之见、排斥甲骨文及对现代学林的影响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,与胡先生商榷。

[关键词]现代学林点将录;章太炎;乱点鸳鸯谱

启蒙事业逊康梁,排满赢来举国狂。

并世学人别流派,章黄原不及罗王。^[1]

此诗是胡文辉所著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中对章太炎的品评。“点将录”源于明季党争,清代以降,学人将之用于品评诗坛人物,成为一种新文体。胡先生将这一文体引入现代学林,著成一部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。“点将录”这一文体,虽貌似游戏文字,但作者申明是以严肃的态度在做一部学术史,即“以‘点将录’的形式评点学术人物,并非纯属文字游戏,也是具体而微的学术论衡。”^[2]胡先生指点学林,激扬文字,笔者拜读后深感获益良多,但是对于将章太炎拟为托塔天王晁盖,“似扬而实抑”,将之摒于现代学林正榜之外,以及书中关于章太炎的诸多论断,与胡先生有不同的看法。先贤有云:“学术,乃天下之公器也。”因此笔者不揣谫陋,后生小子,敬献一得之愚,以就教于胡先生。

作者简介:丁守伟,历史学博士,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。

一

“启蒙事业逊康梁，排满赢来举国狂。”胡先生认为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徒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属改良派，一方面倾力于保皇立宪，一方面开启风气，“启蒙之功莫大焉”。章太炎、黄侃师徒在政治上是激进派，鼓吹排满革命。与康、梁相比，章、黄“在政治上未免冒进。”^[3]可见胡先生对章、黄师徒的排满革命抱持非议的态度。

辛亥革命前，康、梁师徒从事改良，章、黄师徒从事革命，彼此政见对立，并曾爆发激烈的论战。由于论者立场的不同，或赞同革命，或主张改良。笔者在此不拟评鹭改良与革命的孰优孰劣，但认为世人对于章太炎的排满革命存有误解，不可不辨。对于章太炎的排满言论，世人多给他贴上“大汉族主义”或“狭隘的种族主义”的标签，这是对他的偏见。业师王玉华先生指出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，“是由他的民族思想所导致的必然的逻辑结论，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，是出自于他的大汉族主义心灵的自然流露，更不是出自于他的对于满族抱有仇视心理的种族偏见。”章太炎认为，人类的各种族间无所谓高下优劣之分，他们都是平等的。而由于民族是种族的扩大与延伸，这样，“在章太炎的思想逻辑里，就自然地会形成‘民族平等’的思想。”在他看来，各个民族不仅是平等的，而且也是自立的，任何民族皆无统治他族的资格。章太炎主张排满，目的是为了光复旧物，恢复汉族的统治。^[4]汪荣祖先生认为，“他的排满思想乃辛亥革命前致力于革命的思想武器，并非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全部。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是针对近代的帝国主义。”武昌起义后，“他立即结束排满，主张五族共和，以全力来对付外国帝国主义。”^[5]

“启蒙事业逊康梁”，与章、黄相比，康、梁的启蒙之功，世有公论。但“排满赢来举国狂”，此处之“狂”，凸显出论者对章、黄排满革命的指责。但笔者认为，章太炎高举排满革命的大纛，笔扫千军，在推翻帝制、缔造民国的过程中，居功奇伟。章太炎本人对此也颇为自矜，“自余主笔《民报》，革命之说益昌，入会之士益众，声势遂日张。”^[6]认同章太炎革命功绩的汪荣祖先生，甚至主张章太炎应该和孙中山同享国父的盛誉。^[7]章、黄所鼓吹的辛亥革命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，是中国从此告别帝制，开始步入新的时代。因此，启蒙事业虽逊于康、梁，章、黄的革命功绩将万古流长。

二

“并世学人别流派，章黄原不及罗王。”胡先生是说与罗振玉、王国维相比，章太炎、黄侃在学术上是保守派，“以保存国粹为号召，排斥新材料、新方法”。罗、王在政治上虽然是保守派，但在学术上却是革新派，以出土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为志业，尤其在甲骨学方面有开创之功。因此，章、黄跟罗、王相比，在学术上又嫌滞后。“他们虽能在古音学方面后出转精，却自限于传统小学的旧樊篱，不

能转入现代语言学的新天地。”胡先生还认为：

章氏最严重的毛病，尤在门户之见太深，意气之争太甚。康有为信从今文经学，他以古文经学作为对抗；罗、王治甲骨文而声名鹊起，他则斥甲骨文伪造；汪荣宝借佛经译音等资料考订古音，为音韵学另辟新径，他又指责为“浅者且取异域侏离之语以求古音”。号为文字音韵学权威，这可算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大败笔。^[8]

基于以上的理由，胡先生虽然称章太炎为“古典形态的博学宏儒，于学无所不窥”，并且视野超乎中土之外，但由于他在学术上是保守派，存有严重的门户之见，所以将之拟作托塔天王晁盖，列为旧头领一员，把章太炎“摒于现代学林正榜之外”。此外，胡先生还认为章太炎虽久享“国学大师”之誉，但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并不深刻。对于上述论断，笔者难以苟同。

先谈谈章太炎的门户之见。章太炎论学，门户之见相当明显，但这并不是一种意气之争，而是他针对当时学术界弊病而开出的解弊之药方。在他看来，当时中国学界并非过多门户，而是“其病多在汗漫”。“汗漫”之因，其表是缺乏己见不能自立，其里则是慑于一尊不敢放言。“救治之法是重新高扬先秦诸子自立门户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：首先是敢于自立门户，然后才谈得上百家争鸣。”^[9]章太炎强调先要学有所守，然后才谈得上创新。学有所守，并不是墨守师法，更非是党同伐异。章太炎并没有囿于门户之见，反而对“为学无常师，左右采获，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”^[10]深表赞许。章太炎虽以古文经学为根基，但他同时受到康有为所治今文经学的影响，许多学者都已指出了这一事实。但不能如论者所说，章太炎治古文经学，是为了和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相对抗的门户之见、意气之争。

至于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排斥，更有进一步申论的必要。作为最后一位朴学大师，“乾嘉汉学的集大成者”，章太炎并未研究并且排斥甲骨文，他以此而蒙受“恶名”，被众多学人指责为“顽固”、“保守”，在学术上“固步自封”。胡先生甚至认为，章、黄对甲骨文的排斥，反映了他们“治学皆偏于守旧，都不能如王氏据新材料而有新发现，故其态度不免有酸葡萄的心理。”^[11]

笔者认为，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排斥，与他“无征不信”以及“识大体”的治学风格息息相关。以下就以史学和文字学为例，探讨章太炎排斥甲骨文的深层原因。

章氏治学，特重史学。自甲骨文字出，史学界以甲骨文治史之风日盛。王国维研究甲骨文的贡献，主要就在于证史。章太炎的史学研究，却对甲骨文持以排斥的态度。章太炎认为上古年代久远，“往古多不可稽”，指责一些学者滥用甲骨文证史，是所谓“好画鬼魅，恶图犬马也”。^[12]史学强调要“实事求是”、“无征不信”，对于文字学，章太炎也是如此。他曾云：

今日举国学子欣欣然考证龟甲，研求钟鼎，推求陶瓦，各自以为得。其考证甲骨者则凿凿于某字《说文》作某，钟鼎又作某，某字应读某声，穿凿附

会之态较之研究钟鼎者尤为可笑。而不知龟甲之真伪本难分别,何况其证据又薄弱无力!^[13]

章太炎的批评,并非无的放矢。在当时的甲骨文字研究中,确实存在他所指责的“穿凿附会”、“妄加推测”的弊病。唐兰曾力斥近人用“猜谜法”辨识古文字,“形成望文生义、向壁虚造之学风,至可厌恶。”^[14]

章太炎指出,钟鼎甲骨文字不可“妄识”,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不得强不知以为知。”^[15]他认为上古文字传至后世有四途:一为《说文》独体字;二为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古文,有《说文》所未录者;三为邯郸淳三体石经;四为陈仓石鼓。“四者之外,宜在阙疑之科。”^[16]甲骨文字显然属于章太炎视野中的“阙疑之科”。

章太炎曾对其晚年弟子姜亮夫提及王国维,认为,“王君证《史记·殷本纪》无虚言,说明史公书之可贵,而《殷周制度论》亦能服人心腹。”但又语重心长地对姜亮夫说,“你也习甲骨文,此事真伪难辨,食肉不食马肝,未为不知味。”又云:“凡大儒之学,以关族性为圭臬,何必定马肝,马肝亦有毒,何必为此雕虫小技?”^[17]

章太炎称甲骨文为“雕虫小技”,在此强调为学要以关“族性”,同时也表明治学要识“大体”。1935年,章太炎在与金祖同的书信中,论及为学之道,“君子为学,固当识其大者,其小者一二条之得失,不足以为损益也。”又云:“龟甲且勿论真伪,即是真物,所著占繇不过晴雨弋获诸碎事,何足以补商史?”^[18]应当指出的是,殷商王朝十分迷信“天”,在行事之前往往进行占卜,因此甲骨卜辞中隐含着大量的殷商时期的政治、经济信息,并不仅仅是“晴雨弋获诸碎事”,其内容丰富,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。对于资料匮乏的殷商史而言,甲骨文重要的补充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章太炎没有认识到甲骨文对于殷商史研究的重要性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,章太炎即便讲稽古之学,也是追求“窥大体”、“得大体”,不满足于“致谨于名氏爵里之间”。^[19]

董作宾称章太炎“是我国学术界唯一不相信而反对研究甲骨文字的人”,并称章氏“奉《说文》为金科玉律,不容以钟鼎甲骨订正《说文》之讹误。”^[20]章太炎并非奉《说文》为金科玉律,事实上他纠正过不少《说文》的疏漏。不过章太炎的文字学,确是奉《说文》为正宗。他认为《说文》是其“本”,是“大体”,甲骨文等属于“末”,“若乃奉矫诬之器,信荒忽之文,以与召陵正书相角,斯于六书之学,未有云补。”^[21]他反对以甲骨文取代正统的《说文》。

张中行曾评价章太炎,“治学好奇,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,如著文好用奇僻字,回避甲骨文之类。”^[22]事实上,章太炎排斥甲骨文,正是反对某些甲骨学者的标新立异,为学不能“实事求是”、“不识大体”的学风。

就甲骨文而言,李学勤先生认为有4500字左右,迄今为止考释出的字还不满一千。“有些最基本的字,我们还没有做很好的研究,最重要的一些卜辞,我们还是读不懂。”^[23]而在章太炎那个时代,能确定的甲骨文更少,甲骨文的研究

还处于初始状态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,章太炎认为甲骨文“宜在阙疑之科”,批评当时学人“穿凿附会”及滥用甲骨证史,我们不能对此过于苛责。

此外,胡先生认为章太炎虽久享“国学大师”之誉,但他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并不深刻。这种论断也与史实不符。章门弟子庞俊,在论述其师之学时,云:

昔休宁戴氏之论学也,其言曰:“学有三难:淹博难,识断难,精审难。”

以是为衡,近世学者,兼此三长,厥惟章先生。语其卓绝,实为三百年来所未有,此天下之公言也。^[24]

庞俊将其师推许为近三百年来第一人,虽有过誉之嫌,但章太炎的确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,其学问之精博,识断之精审,庶谓是“古今无两”。不宁唯是,他“还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的闸门,成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关键性人物”。^[25]

章太炎及其弟子对于近代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,可以和数千年前孔子及其弟子的功绩相媲美。作为一代国学宗师,章太炎的弟子有黄侃、汪东、钱玄同、朱希祖、周迅、周作人、吴承仕等人,章门弟子的天空可谓是群星璀璨。他们无论是在白话文运动还是语言文字改革等方面,都是主持者和重要推动者。并且在语言学、文学、史学与民俗学等领域,亦发凡起例,创获极多,“为中国传统学术实现近代转型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。”^[26]

以影响现代学术史甚巨的新文化运动而言,除了章门弟子大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外,其他无论是发动者、支持者,还是反对者、中间折衷者,大都曾蒙受章太炎学说的培植之恩。新文化运动的两员干将之一,被胡先生列为现代学林正榜头领第一员的胡适,并不讳言自己受到章太炎的影响。他在其第一部著作——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自序中说,他做这部书,近人之中,“最感谢章太炎先生。”^[27]曾为北大学子的毛一亨,对章太炎与胡适之思想关联有过生动的观察。他说:“据我所知,胡先生之墨子,系取太炎先生的说而发挥之(在港遇钱宾四,宾四亦以为然),其实岂只墨子,胡先生乃唯一能发扬太炎之学的人。”又云:“太炎先生诋胡先生不懂小学。我曾对他说,你的学问,当以胡先生为唯一传人,你的话只为他能完全懂得而加以消化,并予以通俗化。”^[28]

章太炎不仅是“旧学的殿军”,也是“新学的开山”,^[29]对现代学林影响至巨。所以胡先生虽然坦诚自己偏向于现代标准,重创新而能“引入新方法、开拓新领域者,有独特个性、有自家面目者,作出基础性、专题性史料功夫者,皆拔高一等”,^[30]但以章太炎在学术上的开创之功以及对现代学林的影响力来看,即使以胡先生的标准来衡量,也不该列章太炎为旧首领一员,将之摒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。

诗曰:

近代诸子气象森,太炎先生最可称。

笔扫千军无能敌,开风不及梁饮冰。^[31]

注释:

[1][2][3][8][11][30]胡文辉: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10年,第5、例言第1、3、4、16、例言第1页。

[4][25]王玉华:《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——章太炎思想的阐释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,第9页。

[5][7]汪荣祖:《章太炎散论》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205、218页。

[6]章太炎:《民国光复》,马勇编:《章太炎讲演集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4年,第182页。

[9]陈平原: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、胡适之为中心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265页。

[10]章太炎:《俞先生传》,《章太炎全集》(四)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年,第211页。

[12]章太炎:《教学弊论》,《章太炎全集》(五)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年,第103页。

[13]章太炎:《论今日切要之学》,马勇编:《章太炎讲演集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4年,第94页。

[14]张舜徽:《研究金文甲文必以说文为基础》,《爱晚庐随笔》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28页。

[15]章太炎:《说文解字序》,《正论》1935年第33期。

[16][21]章太炎撰:《国故论衡疏证》,庞俊、郭诚永疏证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220-223、235-236页。

[17]姜亮夫:《姜亮夫全集·回忆录》(二十四),云南人民出版社,2002年,第288页。

[18]章太炎:《与金祖同》,马勇编:《章太炎书信集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3年,第964页。

[19]章太炎:《近史商略》,《章太炎全集》(三)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590页。

[20]董作宾:《甲骨学六十年》,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董作宾卷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6年,第194-195页。

[22]张中行:《章太炎》,陈平原、杜玲玲编:《追忆章太炎》(修订本),北京三联书店,2009年,第287页。

[23]李学勤:《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,《殷都学刊》2010年第1期。

[24]庞俊:《章先生学术述略》,《章太炎生平与学术》,北京三联书店,1988年,第20页。

[26]郑师渠:《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·序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年,第1-2页。

[27]胡适: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中华书局,2013年。

[28]王汎森:《章太炎的思想(1968-1919)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2页。

[29]汪荣祖:《史学九章》,北京三联书店,2006年,第123页。

[31]王玉华:《答菴鮑归客二首》,《梅溪存稿》,台湾: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,2011年,第365页。

[责任编辑:钟和]